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张碧波摇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illegible]）数据
摇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摇张碧波著摇—哈尔滨：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illegible]
摇[illegible]

摇Ⅰ摇中[illegible]摇Ⅱ摇张[illegible]摇Ⅲ摇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古代摇Ⅳ摇[illegible]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illegible]数据核字（[illegible]第 [illegible]号

责任编辑：刘恺汐摇张晔明
扉页题签：曹惠南
封面设计：于克广

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Zhonghua Zaoqi Wenming De Wenhua Renleixue Kaocha

张碧波摇著

出版发行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摇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illegible]号楼 （[illegible]）
网摇摇址摇[illegible]
印摇摇刷摇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摇摇本摇[illegible]毫米 [illegible]
印摇摇张摇[illegible]
字摇摇数摇[illegible]
版摇摇次摇[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第 [illegible]版摇[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第 [illegible]次印刷
书摇摇号摇[illegible]

定价：[illegible]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摇摇录

序 …… 张松泉 (员
前言 :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论略 …… (员
第一章摇中华早期文明崛起的历史起点 …… (圆苑
第一节摇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腾画像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兼及中印蛇文化的比较研究 …… (圆苑
本文就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像以及灵蛇崇拜问题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揭诸图像与灵蛇崇拜所显示的古老宇宙观的庞大结构及其文化人类学涵义与人文意蕴,从中看到中华古史从野蛮混沌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历史进程 ;在从灵蛇到神龙的演化过程中,透视出神权与王权、天文与人文相结合相统一的中华文明早熟性特征。全文又以蛇文化的世界性以及中国与印度两大古国灵蛇文化的比较研究作为另一主线,对中印古文化亲密关系作了一些探索。
第二节摇颛顼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诸问题 …… (猿苑
通过对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学与青铜文化的考察以及颛顼高阳氏在古文明建设上的功绩的探索,确定了颛顼高阳王国的历史存在,并对它处于中国文明史初期阶段诸特征以及这个王国最后的消亡原因进行了探索。全文根据中国古史、古文明史的特点,区别于西方文明理论,提出宗教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上的重要作用的观点。
第三节摇《尚书 · 尧典》,中华早期文明的开篇 …… (远源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重新审读《尚书 · 尧典》,就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王者 原智者 原巫者”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禅让说的文化人类学解释三方面,接触到中华早期文明诸特征问题。

第四节摇《尚书·禹 贡》与人文地理学及文明中心观之始原 …… (76)

《尚书·禹贡》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阐述人与地关系的经典。《禹贡》划分王朝的疆域为九州,并建立五服贡纳制,反映了夏代是产生中华文明中心观念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认知体系的历史阶段,并首次接触到地理环境生态与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第二章摇中国古代文明史第一代文化人:

殷商文化从神本向人本的蜕变 …… (102)

第一节摇伊尹论 …… (102)

伊尹处于夏商易代之际,处于文化转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代文化人、智者,他出身于巫史,并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辅佐成汤推翻夏王朝。他的国家学说、君主学说以及他为殷商王朝建立文物典章制度,使殷商奴隶制发生变革,使其带有明显的人文文化色彩,推动殷商王朝成为具有东方亚洲特点的奴隶制国家。以伊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文化人多重身份的特点,它又正是中国文明史开端期最鲜明的特点。

第二节摇论商王武丁与傅说、祖己 …… (135)

以外藩入继大统,改变商王朝兄终弟及继位制的武丁,为解决内忧外患,从社会底层中提拔与任用傅说和祖己。接受傅说的“学于古训”、“师古”——继承成汤伊尹文化传统,接受祖己关于祭祀礼仪制度的变革,增大了殷商奴隶王朝的人文精神,揭示了殷商王朝的文化发展与变化轨迹。傅说与祖己的国家论与君主论充分表现了我国自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代最具文化品格的文化人的精神风貌。

第三节摇箕子论 …… (153)

箕子是殷商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他处于商末周初的历史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与殷纣发生激烈的道与势的冲突,在国家破灭时,走之朝鲜,建立箕子朝鲜地方政权,臣属于周王朝。在朝周时,向周武王讲授《洪范》——治国之大道——其中熔铸了箕子的世界和社会构成与结构体系观念与系统的国家哲学学说。并据此把箕子朝鲜

建成东方君子国。
第三章摇饮食与纹饰中的商周文化更迭管窥 …… (员责)
第一节摇殷纣的饮食文化与商周的文化更迭 …… (员责)
殷纣的饮食文化是将殷商文化中非理性、张扬个性、不断探索创造层面发挥到极致，这也是周人所以灭商的一个正当理由。商周文化的更迭标志中国文化从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化，周人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均纳入礼的范畴，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性质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二节摇饕餮纹饰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的人类学思考 …… (员责)
饕餮纹饰图像是研究与认识商周文明的一个窗口。
饕餮纹作为商周青铜器上的主体纹饰，自有其文化渊源；作为一种时代的文化符号，它所显示的神灵崇拜和社会结构，集中揭示了纹饰图像中蕴含的王朝主体观念；青铜器上纹饰图像的变化标明商周王朝的更替反映在文化上的更迭。从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饰图像及其变化，可以看到商周文明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摇周文王与早周文明诸问题 …… (员责)
第一节摇《逸周书》与早周新文化观 …… (员责)
在殷商王朝灭亡前的一个世纪中，商周两大民族之间曾发生残酷而激烈的斗争，王季与文王之死就是两者文化冲突的历史确证。揭露两者文化冲突的复杂内涵，用以揭示商周文明史的历史本质是一很重要的课题。《逸周书》中保留文王的文告训辞，其中反映了周人的新哲学观念、天人观念和民本思想，它们集中表现了早周文化诸特征，为西周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摇《逸周书》与中华救灾史上第一文 …… (员责)
《逸周书》的《籴匡解》、《大匡解》是周文王两篇救灾文告，包含救灾领导机制、管理体系与政策措施。其中突出表现因灾问政、因灾罪己的承担责任、接受监督、动员全国力量全力抗灾救灾思想行为，蕴含周文王及其早周文化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救灾史上第一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三节摇《逸周书》与中华生态学史上的开山之作 …… (员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逸周书·文传解》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中华生态学史上的开山之作。距今3000余年周文王与太子发谈论治国之道时重点阐述了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文化生态学诸问题。处在伐纣灭商前夜的周文王论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有生命、有秩序的自然世界中,人类应掌握自然世界的生长周期与生长规律,以使人与自然达到"和德"的境界;其二认为人与自然界处在一个不断调整的关系之中,从依赖型向改造型过渡,应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国家职能以实现生物多样化与文化多样化。最后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掌握开、塞、禁、舍的辩证观念,方可处理好这一关乎"取天下"与"失天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西周农业文明已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第四节 《逸周书》与中华军事学史上的开篇之作 …… (3)

《逸周书》收《武称解》、《大武解》、《大明武解》、《小明武解》四篇军事学论著,属早周文明中的军事文化,应为周文王所撰著。其中首次提出政治伦理型军事战略学命题——"武学",涵盖了早周军事学的基本体系,揭示了从"善政(征)不攻"到"善斗不败"的军事战役战术学构想,并接触到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的辩证关系,成为中华军事学史上的开篇之作。其"武学"观念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周文王的有关军事学论著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直至今天仍有启示作用。

第五章 中华文明史早期文明以德为核心的巫文化向王文化转变的考察
…… (3)

第一节 姜尚与《六韬》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 (3)

姜尚其人关乎商末周初一段朝代更迭史和文明史,关乎西周王朝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本文对姜尚的出身、年龄、名号、身份作了考辨,并对《六韬》作了文化人类学的透视,与殷商文化传统的对立,揭示姜尚在《六韬》中新的天下观、天道观、国家论与战争观,动摇了天命有归的旧格局,打破了殷商天帝与人王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周文武灭殷建立新王朝的有力武器与战略指导思想。最后指出姜尚《六韬》的综

合性——中华早期文明的一个特点，以及姜尚封于齐、形成周初区域文化格局问题。

第二节摇周公及西周初期王巫结合的文化诸问题 …… （圆景

周公处在商周王朝更迭、西周政权巩固时期，这是一个思想信仰文化大变动、大创建时期。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周公其人，周公摄政称王中所显示的各种文化冲突和他的“尊尊亲亲”治国方略所展示的西周思想、信仰体系，并揭诸中华早期文明诸问题。确认周公是一有巨大影响的中国历史巨人，是中华人文始祖之一。

第三节摇《周书》中的天命观念及其形态的考察 …… （圆范

天命观念做为周朝王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表象，是西周王朝思想信仰体系的核心支柱，是周朝统治集团用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与建设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本文从天命无常与有常的辩证观、文王受命、人助即天助、卜兆即天意，以及天命观与命运观之比较五个方面探索了天命观所体现的中国式的伦理文化与人文精神，揭示了它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与强大的启示力诸问题。

第四节摇《周书》中的德政观念与周人建国、治国的战略观念 …… （圆范

《周书》中的德政观念是与周文武、周公所创造的天命观相互为用成为周人争夺政权、巩固政权、建设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周人用以构成战略观，体认人类历史是一部德政史的历史观，德政又成为周人的国家行为规范与君王行为规范。最后探索了道与道德各自范畴问题。天命观是周人的宇宙论，德政观是周人的伦理观与社会观。它们成为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之一，为中华文明从早期向更高阶段过渡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摇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专题考察 …… （圆源

第一节摇论秦楚丹阳、蓝田大战背后的文化冲突

——从《楚辞·九歌》与秦《诅楚文》说起 …… （圆源

《楚辞·九歌》与秦《诅楚文》是为楚秦丹阳、蓝田大战而创作的军事、祭祀文学。河南淅川吉岗楚国阵亡将士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和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容解析，证明它们产生在

楚秦丹阳战后蓝田大战前夜，楚与秦各自举行大型祭神活动，召唤神祇，并运用五行相生相克观念以求压倒对方，祈求战争胜利，表现出战争行为背后的激烈的文化冲突。

第二节 摇朝鲜半岛古文化渊源的考察 …… (摇摇)

朝鲜半岛古文化渊源的探索是一个关乎半岛文明起源的大问题。本文凭借有关文献学资料，从六个方面进行探索，一、二、三题是对半岛古地名、古族文化的探索，认为半岛始初的地名旸谷源于中华先民在半岛上观察海上日出，“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民时”，其原住民嵎夷（雀夷、鸟夷）创造了汤谷扶桑十日神话，夏商时演变为明夷，商周时又名朝鲜，均为海上日出之象。四题是对朝周的半岛古族的探索。五题对辰国的产生及其政权性质作了探索，并对古韩族族名文化作了臆测。六题对半岛上颛顼高阳三种文化习俗：卵生、羽民、扁头进行了研究。箕子正是在对半岛历史文明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于国亡之后“走之朝鲜”、“箕子之明夷”，在半岛北部建立箕子朝鲜政权，是为中国东北文明史之开端。综合上述认为中华文明给予半岛古文化以强烈影响，促进了半岛古文明的产生，加速了半岛文明史的历史进程。

第三节 摇从文化生成的原生态角度考察西藏高原与中华内陆的历史文化联系 …… (摇摇)

本文从四方面探讨西藏原生态文化的渊源、性质及其与中华内陆的历史文化联系问题：藏族与中华内陆先民共工触不周山神话的解读、藏族的天梯神话与中华内陆天柱、地维神话的渊源关系、藏族与中华内陆各族先民的团蛋生人观念的同一来源、藏族与中华内陆各族先民猕猴祖源神话的一体性，充分论证了西藏高原与中华内陆的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及西藏高原之东向发展的主要缘由。

参考文献 …… (摇摇)

后记 …… (摇摇)

序

张松泉

张碧波先生的史学论著《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对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腾画像的文化人类学的解读、对颛顼文化、红山文化的宗教——巫术特征的论析、对《尚书·尧典》篇、《禹贡》篇中所突显出的文化人类学涵蕴的发掘、对殷商文化从神本向人本的蜕变、对《逸周书》周王朝建国、治国战略与策略的研讨以及对周代第一代文人从巫文化向王文化的转化等诸多课题的学术建构，无不彰显其史学新探所独有的令人欣羡和瞩目的骄人成就。这部论著并不是单篇独立、互不关联的论文结集，而是不拘一格，自成体系的中国早期文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论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当代视野的烛照下，集历史文献钩沉、史实考订与史论解析于一炉，新见迭出，旁征博引，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实为难能可贵。尤其是，这部论稿中的绝大多数论题，无不富有新意，确实触及此前史学界极少论及的研究课题，可以说不仅带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而且为此后相关课题的研究拓展出一个崭新的研究畛域。

《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这部论著，侧重以当代史学眼光重新解读中国史科元典，并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深入解析，可以视为当代视野下的史学新探。张碧波教授指出：殷承夏制，周因殷礼，至周朝时，中国早期文明不仅更加完备，而且愈加自觉，如礼、乐等典章制度，从建国、治国战略策略、政权机构设置与官职划分，从公侯伯子男的贵族等级建制到庶民的管理教育，从人的生活方式、交际规则、伦理法制到处世态度，从人的生产生活到人的思想信仰等，都建构成为具有规范性与民族凝聚力的早期文明体系。基于上述识鉴，他在论著中还郑重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史学命题，由于篇幅所限未及充分论证，它们是：一、他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着一个玉文化时期，玉文化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这是一个久为人们所忽略的中国最早而又相当辉煌的一个文化时期，它的历史内涵应予重新认识与深入探讨；二是巫文化是新石器晚期

中国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它的历史文化涵蕴也极为丰富多样，也是一个久为人们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缺失与空白在史学探索上应予弥补；三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代文化人的诞生及其对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史学话题。我认为，这些史学命题的提出，并非生造与玄想而是具有足够丰富的史料文献据为印证的，其识见可谓十分珍贵。书中的这些识见与理念相当纯熟深刻，立论扎实，条分缕析，对中华民族早期文明所能涉及的文化人类学问题，都尽力给予简明、切实而又富于创造性的独到解说，科学地给中华早期文明的性质与历史内涵以明确定位，高度重视其人文价值与人文导向。《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涉及面广，作者敢于并善于从众说纷纭，讫无定论的学术难点处落笔，而又善于超越前人相关论著的传统观点，站在更高的学术位置作出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具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与史实剖析，我个人认为，这一史学成果是确有独立建树的扛鼎之作。

张碧波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一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史学研究课题，是具有长期的学术积累与理论准备的，他本人早已是一位卓有成绩的中国文学史家，著有《中国文学史论》和《中国文学简史》，对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与中华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关联性具有相当深入的历史反思与重新建构新解的强烈愿望，到了上一世纪 年代，他转向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对文学、史学、文化学、人类学诸学科的内在关联性具有独到的见解。因此，他的长期学术准备使他能以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与文化史实为依据，以当代世界居于领先地位的学术理念为先导，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为主旨，科学地阐述了中国史前社会文明的人文内涵与文化意蕴。这部论著运用了科学的历史辩证观点，从人类学、文化学和史学三个考察维度出发，相当深入地阐述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而给人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文明相关的问题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总之，这是一部史料丰富，文献征引翔实，观点新颖，富于创造性和具有独特学术切入点的史学专著，它的出版是我省乃至我国史学建设的一个难得的贡献。我深信定会受到史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最后，谨向张碧波先生祝贺新著出版，并祝愿今后在史学研究领域能够继续作出更多、更大的学术贡献！

写于 年 月 日

前言 :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论略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讨已进入深入阶段,诸说并起,均试图说明中华文明之起源、中华文明之特质以及中西方古文明之差异等问题。这些研究与争论,均在运用或寻找中外关于文明理论以期解决中华文明史诸问题。“靠史料说话”,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之一,史实是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而理论指导,“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就会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这又正是中华文明史诸问题研究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本书就是试图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作一初步考察,以期有益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以之就教于方家。

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者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中华文明特质等问题时,多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部经典作为理论指导,这是正确的理论指向。这部经典指导我们从考古学资料与文献学史料的综合分析中,认识中国古代文明之出现、社会技术之进步与专业分工、政教中心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形成等中华早期文明诸问题。恩格斯的学说,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理论武器,这无疑是正确的,并因此获得可嘉的成果。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具有极大普遍意义,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但惟其普遍意义,对于具体如中华早期文明起源与形成诸问题,就有不完全“适用”的问题了。张光直先生指出:“西方社会科学输入中国以来,有许多西方的法则便直接地套到中国史实上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和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相对比,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我相信大部分代表人类的法则是可以适用的,但有一部分是不能适用的。这些不能适用的部分有的就牵涉到文明城市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家的起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是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对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这个古史分期之外,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我相信,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历史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彼此照应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入手途径。”①

张光直先生在其学术晚年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找到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学说:“对于熟悉马克思、恩格斯、韦柏、柴尔德等关于社会进化和城市、国家兴起的各种理论的社会学家来说,中国走向文明之路却好像是一种变型——常常称为“亚细亚式的‘变形’。”②

张光直先生在其晚年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时认识到需要新的理论指导,认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可以解决“文明城市和国家起源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关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对这个学说的内涵,它所指的社会形态的性质,如何依据这个学说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等均存在争论。现在让我们看看马克思的论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③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惟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

---

①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②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illegible]卷,人民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世袭的占有者。”①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②

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论述，古代中国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早熟的儿童”，而与“古典时代（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正常的儿童”相对应，东西方古代社会走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所谓“早熟的儿童”实指文明与国家孕育产生在“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公社而赐予他的”③。这是在氏族公社解体之前，已产生“总合的统一体”、“更高的所有者或惟一的所有者”，即在进入部落联盟阶段就产生了王权、产生了君主，氏族公社提前迈入文明的门槛，即产生了“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早熟性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东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特点，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性特征，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

马克思关于古代东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的学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理念的命题，不可能完全符合古代东方社会的实际，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实际，但其中有些观点可以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在掌握其基本精神上加以理解、运用，这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会有启示作用。结合中华古史的实际，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或曰中华文明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玉器文化与彩陶文化的出现标志中华文化从原始氏族阶段转向文明阶段，这二者的出现，应看作是中华文明的原型形态。从素面陶到彩陶，从生产生活用具转化为神器、礼器；玉器成为政治权力的标志，成为中华古代政治权力的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月］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第 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页。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第 页。

工具，玉器首先用作祭器，是重要的礼器，占有玉器就占有了权力，而神权正是王权的根源。“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宗教权力与军事权力是王权的两大根源。古代中国，王者、巫者结合，宗教与世俗权力统一，王者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国家的“总祭司”、大宗教主、历法的制定者、天神意旨的传达者，方可成为国家之主、人民之主。而中华早期王者权力多来源于对神权的占有。

[illegible]人类诞生创造了巫史文化，即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万物有灵，人人皆可通神，直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①

古代之巫、觋是主持“明神降之”的通神仪式的大祭司，是沟通天地、掌握天地的智者、圣者。由万物有灵，民神杂糅，人人均可通神到专职巫觋的出现，独占通神的权力。而这些巫觋又是王者。“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②“君及官吏皆出自巫。”③是知，中华早期文明之王者本与巫者为综合一物，或者王者即出于巫者，王权即源于神权，部落联盟首长身兼巫觋，独占神权，神权、宗教权、沟通天地的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贯通天地、阴阳、生死，而玉器、彩陶就是通天权力独占的象征。“而且是制作通天工具原料独占的象征。”对玉器、彩陶的象征性独占，正是古代王者获取与维护政治权力的主要手段。

[illegible]巫觋的另一重要职务是“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掌握天地之历数，即掌握天宇、掌握宇宙、掌握天人关系，这是巫者的也是王者的职能。正揭示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王者与巫者的一种内在的特殊联系。《左传》曾保存上古文明史料，其中著名的如昭公十七年（前[illegible]）郯子来朝，向昭公谈上古历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

① 《国语·楚语下》。

②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illegible]年，第[illegible]页。

③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中华出版事业委员会，[illegible]年，第[illegible]页。

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①

这是记述从黄帝伊始,古代王者创造、掌控与垄断天文历数,天数与权力结合为一的文字史料。正揭示出王者兼巫者,王巫合一是中华早期文明的一大特点。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腾画像,手执规矩,画方画圆,掌握天地,沟通天地,头顶日月,背负星辰,则伏羲、女娲为创世者,规划宇宙、掌握天数的智者、圣王、万物之祖、人文始祖。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像,这种半人半神,半人半兽的形态,正标明中国社会从野蛮世界向文明世界过渡,在过渡过程中,新世界极力挣脱旧世界的羁绊而尚未摆脱旧世界印迹的特定状态,这又是中华早期文明诞生阶段一个鲜明特点。

张光直先生曾说:“如把中国新石器时代和三代文化发展划成一条直线则可以分成几个清楚的段落,即:

新石器时代,代表原始社会,阶级未萌的阶段;

玉琮时代,代表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亦即《国语·楚语》所说帝颛顼令重黎二神绝地天通的时代;

青铜时代,代表巫政结合进一步发展产生国家、城市、文明阶段;

铁器时代……”②

上古三代文化发展确有一个玉器时代,依据考古学与文献学提供的大量史料,并根据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早熟的儿童”学说,我们认为玉器时代已具备中华早期文明产生诸种条件,它已成为中华古代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

玉器时代与文明起源

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着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民族文化格局与文明进程。中华大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东西落差形成三级巨大阶梯,南北跨度达[illegible]个纬度,这既决定了文化——文明起源的本土性,又形成了极其不同的

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多种文化——文明生态环境，构筑了多种不同的人文发展机遇和文化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区系。这多元的文化区域之内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是多元的，不平衡的，从而形成相当复杂的文化谱系。由于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之变化与制约，如气候之由暖变冷，降雨量之由多变少，以及土地条件，河流变迁等等，使一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又由于民族集团本身的发展，如生活能力（生存与繁殖），体质变化，集团间的战争，形成部落联盟的运动速度等等。这二者相互作用，制约与影响（甚至带有决定性）这一文化区域或某一文化区域中民族集团文化的发展速度，影响着这一文化系统的性质；出现了文化系统中的变动，转化，转移，出现了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交流，融合与叠压，也因而出现了文化系统的先进与落后的发展差距，出现了某一文化系统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并成为各文化系统的中心的中心，各文化系统由多元向一元转化，逐渐形成中华文明的初期形态。“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前 [illegible] 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①

我们认为中华早期文明是先后在四个文化区域中产生（起源）的；这就是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

让我们根据文献学与考古学的有关资料作一概要说明。

一、大汶口文化

始自公元前 [illegible] 年的大汶口文化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区，表现出国家文明的初期特色。其一是聚落规模的扩大和中心聚落的出现。大汶口遗址面积大者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小者数万甚至不足万平方米；并已发现大汶口晚期城址。

聚落的规模是经济力、军力和人力的集中反映，大小规模差距则反映了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社会结构体系的出现。

其二是出现男女双人葬，墓室的大小、葬具的有无、随葬品的数量多少、质量的高低等方面，其差距迅速拉大。

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的随葬品中，有“制作精致的石钺、石璧、骨雕筒、陶质羊角形号角、石环，以及刻划图像文字的陶尊等具有身份、权力象征的遗物，无一例外，全部发现在河滩墓地的墓葬中，因此可以说河滩墓地是陵阳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illegible] 年版，第 [illegible] 页。

河居民中权贵家族若干代的祖茔地”①。

上述考古学资料告诉我们：援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现了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集于一身的人物——国王，已出现“聚落等级体系，它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形成”；援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财富的集中，“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借技术和商业程序（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②。猿随葬品如琮、玉璧、玉钺、牙璋等（用以沟通天地的巫师法器），已与宗教礼仪结合，即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念，也反映了巫师阶层的出现以及巫师与王者结合的国家文明初期的文化形成特点，同时也说明了丧葬礼仪制度的初步形成与秩序化。

其三是盛行头骨枕部人工变形、拔除上侧门齿以及口含石、陶质小球而造成齿弓异常变形的文化习俗。这三种习俗或同时出现在一个墓葬中。这种系列性的文化习俗为我们判断大汶口后期的文化族属提供了重要依据。

人工枕骨变形和拔除上侧门齿属于这个地区的族团习俗文化与体质文化上的鲜明特征。而口含石球（考古发现“含球年龄最小的只有 远岁，这好像又暗示这类习俗始于幼年”），这个石球，应属于这个族团的文化标记、文化圣物，从而成为整个族团的文化习俗。

据查：这三种习俗（成年礼仪）应属于颛顼高阳氏及其族团的文化习俗。

颛顼，即头颅尖（扁）长之形象，其父韩流之“擢首、谨耳”，亦为头颅扁长之形。“头似其父”故名颛顼。那么，流行于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古老的改变颅形之习俗，均渊源于颛顼文化，均为颛顼文化之遗绪。

卵民国，“其为人长头”、“其为人长颊”，即为人工改变颅形，是为颛顼文化习俗的一个鲜明特征。

是知，人工枕骨变形应为颛顼高阳族团为尊崇始祖颛顼高阳氏而形成族团的体制文化的标记与文化传统。这种对先祖的尊敬与崇拜，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观念宗族制度的具体反映，是中华早期文明的一个特征。

大汶口文化中的拔牙习俗应属史籍中我国古代的凿齿族。

关于口含陶（石）珠的文化考察：

---

① 王树明：《陵阳河墓地雏议》，《史前研究》，员惩范年第 猿期；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员惩猿年版，第 源愿页。转引自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员惩范年版，第 源源页。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员惩惩年版，第 源愿员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